权力别逼着民众过愚人节

曹 林

又到愚人节了，愚人新闻、愚人游戏、愚人策划、愚人商品，愚人节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娱乐链条并成为一种文化和商业现象。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国人的娱乐精神早已与世界接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懂得娱乐，敢于娱乐，是自信的表现。

愚人节，是市民社会的娱乐狂欢，愚人，是公众之间善意的玩笑。其实，不仅是愚人节这一天，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有娱乐精神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愚人节”文化，面对办公室中、PARTY上、聊天时善意的“愚弄”绝不会生气，而能以轻松和宽容去参与娱乐——因为，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一个玩笑，不是真正的愚弄，而仅仅是恶搞；不是为了整人，而仅仅是娱人；不是真把恶搞对象当成愚蠢的人，往往是找最亲近、最熟悉的朋友去娱乐。

可现实中，有一种愚人，不是娱乐，而是低估人的智商，真正把人当作蠢人去愚弄；不是恶搞游戏，而是霸道地去捉弄那些无力与其平等博弈的人，玩弄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傻瓜的人。面对这样的愚弄，你虽然怒气冲天，却无法“反愚弄”，也去愚弄那个愚弄你的人；虽然明知道这是一场愚弄，你只能选择“被愚弄”，而无法拒绝。这样的愚人，不是一般的愚人，而是权力对民众的戏弄、玩弄和愚弄。

现代社会，可以被同事愚人，不容被权力愚弄。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权力愚人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非常普遍，不仅是个案上的，而呈现出制度性的特征。权力愚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丑闻被曝光后的权力表现。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习惯低估民众的智商，而作一些明显是愚人的解释。比如，陕西某地政府官员私分民间收藏家向政府捐赠的文物，丑闻曝光后，官员向媒体解释说“是保管在个人家中，而不是私分”——这就是典型的愚人。还有，海南某地一个6000多套限价房项目仅仅针对公务员销售，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房价远远低于周边每平方米25000元的普通商品房价格，官员的解释说，是为方便公务员上下班，可为政府节省很多油料——这样的解释难道不是把老百姓当傻瓜！

一些部门对丑闻的解释充满着类似的愚人色彩，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出了差错，都是“技术原因”；下属犯了错误，永远都是个人行为，领导永远都是“毫不知情”。某些政府部门掌握着新闻的发布权、信息的阐释权，垄断着话语权，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们敢于愚人。

其二是某些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上的表现，也是习惯把老百姓当愚人。无论是公开灾难信息，还是突发事件的信息，不少地方拒绝公开最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担心公开信息后会引发恐慌，真相会引发很大的不稳定。比如某地发生手足口病疫情后，当地政府拖延多日后才公开疫情，理由就是“怕引发恐慌”。还有某地流传钻60将爆炸的传言，当地政府拖延公开的理由也是如此。事实真的如此吗？民众真的愚蠢到对真相没有了承受力，一公开真相就会惊慌失措吗？事实证明完全相反，突发事件后充分地公开信息，只能让人更加聪明，而政府捂盖子才是引发社会恐慌的源头。愚蠢的不是民众，而是那个捂盖子的公权力。

其三是在民主问题上，一些官员也习惯低估民众的素质，把民众当傻子。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决策时拒绝实行民主的一大理由是，民众普遍素质太低，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使用民主权利的程度，让他们参与决策，既浪费时间，又容易造成混乱，还无法保障决策的质量。所以，还不如直接让精英们关起门来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已逝的宪政专家蔡定剑先生早就作过系统的批驳，不要低估民众的民主素质，其实，民众在行使民主权利上有一种天然的本能，捍卫自身利益的冲动会让他们去用好手中的权利，民主素养与文化水平无关。农民不懂民主的罗伯特规则，可他们发明的“萝卜青菜规则”异曲同工地反映了民主的本质。

还有，在一些公共问题上，一些部门动辄就想到“管制”的方式，总想去自上而下地去监管和教育老百姓，却不放手让民间去进行道德自治；在民间慈善问题上，正如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所批评的：什么事情都搂在怀里，自己做不过来，又不肯放权、放手让社会力量做——骨子里，也是把老百姓当愚人。

我过愚人节，我快乐；可有些政府部门的权力天天逼着我过愚人节，天天“被愚人节”，我就很不乐意了。

冰点时评

权利脱贫才能走出贫困陷阱

释 均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骅称，我国贫困标准有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比2008年、2009年1196元的贫困标准提高了25%，贫困人口总数将因此大增，再回到9000多万甚至上亿都有可能，另外还要考虑受自然灾害严重威胁、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返贫压力仍然较大。他还强调，提高扶贫标准是要让贫困人口过得更好，而不是解决简单的衣食问题。（《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31日）

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贫困标准的上调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贫困问题最让人揪心的不是贫困标准高低，也不是标准一上调贫困人口就增加，而是“返贫压力仍然较大”，今年脱了贫，明年复又陷入贫困。况且，因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造成的“相对贫困”现象也愈演愈烈。这也恰好印证了林嘉骅先生的观点——扶贫不是解决简单的衣食问题，而是要让贫困人口过得更好。

至于怎么才能“过得更好”，才能不返贫，才能解决“相对贫困”困境，就得从致贫原因说起了。其实，世事无常，际遇有别，暂时的、短期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就像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某些群体即便付出艰辛努力，也无法实质性改善生活水平，无法脱贫。更要命的是，这种“贫困陷阱”往往还通过一些制度机制不断地自我强化。比如，教育高收费，会让贫困的父母无力为下一代进行教育投资，从而削弱乃至扼杀下一代的竞争力，陷入一种“贫穷世袭”的恶性循环。再如户籍限制，农民工再卖力、再优秀，也因农民的身份而对城市户籍“望洋兴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就曾明言，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权利的缺失，使得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很难拥有脱离贫困的机会，而贫困又使得这些人更加难以获得本应拥有的权利。比如，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贫困，部分原因就农民缺少在教育、村民选举、生产资料定价以及土地处置等方面的权利。

真正的扶贫不只是解决钱粮财物，解决衣食温饱，更是制度公平。这就需要打破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并防止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通过自我加强的习俗和惯例继续挖深“贫困陷阱”。而在这个过程中，权利的平等至关重要。通过权利均等，来改善贫困人口“能力缺失”，才能真正脱贫。

百度文库或与QQ聊天室同样命运

普 嘉

针对近日引起纠纷的百度文库问题，百度CEO李彦宏3月28日出席深圳IT领袖峰会时明确表示：“我在公司内部的态度很明确，如果管不好，就关掉百度文库。”目前正在调集公司力量加强反盗版力度。他还进一步强调：“当然，百度还是希望与版权方、作家达成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面对作家的口诛笔伐，李彦宏回应“管不好就关掉”。可惜这番表态很多人并不买账，中国文著协相关负责人说“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不少人认为李彦宏是在摆姿态，百度文库根本不会关！我倒是觉得“管不好就关掉”并非危言耸听，百度文库的遭遇似曾相识，风靡一时的腾讯QQ聊天室不就是“管不好就关掉”了吗？

“管不好就关掉”可谓因噎废食，如果食之如“鸡肋”，废除可能性也很大。百度文库目前对网友是免费的，广告也不多。要是处理不好与版权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百度文库最终成为亏本的买卖，加上早已备受质疑，快刀斩乱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腾讯QQ聊天室一度人气极旺，按理说腾讯是舍不得将其关闭的。但是，为了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的扫黄打非行动，腾讯公司2009年1月8日正式关闭QQ聊天室。当时该公司的声明是：“暂时关闭QQ一聊天室服务，重新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一晃三年过去了，不见开放QQ聊天室的迹象。QQ聊天软件推陈出新，本来还挂着个聊天室的图标，可在新版本中，这个图标干脆无影无踪了。

QQ聊天室和百度文库一样，不过给网友提供了一个平台，有人却利用这个平台做些见不得光的事情。QQ聊天室充斥着色情信息，成为裸聊和同城色情交易的平台；百度文库也被指成了侵犯版权的集散地。这样的局面并不是腾讯和百度愿意看到的，服务商也并非违法内容的提供者。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提供了一把“刀”，至于用刀去切菜还是杀人，决定权是在持刀者手中。

百度到底有没有侵犯知识产权还存争议。事实上，所有提供网友上传下载服务的网站，都存在知识产权的问题。如国内知名网盘服务提供商115网盘，3月7日起全面禁止对影视资源的外链，此举无疑是出于对互联网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近来，无论是在线视频网站还是影视BT网站，都加强了影视版权资源的保护力度。亚马逊近日宣布推出在线媒体存储服务，首先想到的也是该服务可能会引发法律纠纷的问题。面对互联网知识产权的挑战，百度并非一个人在战斗。科技进步是大势所趋，监管或完善也并非百度的家务事，要是真的管不好，像视频聊天网站那样纷纷夭折，那才是一种退步。

相信作家们也不愿意看到百度文库的倒掉。他们更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认可和尊重，并获得版权的收益。

限产 到香港产子的内地孕妇近年以倍数增长，特区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2007年全港约有逾2.7万名内地孕妇在港产子，去年则增至逾4万人，当中1/4选择在公立医院分娩，令其不堪重负，香港考虑限制内地孕妇赴港产子。（中新网3月31日） 漫画：徐 简

“单车强闯交通管制罚款千元”过于严厉

李克杰

3月30日，《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修订草案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三审获得通过，10月1日起实施。根据修订后的条例，非机动车违反交通管制强行通行且不听劝阻的，依旧罚1000元，引起不少主张轻罚人士的热议。（《南方都市报》3月31日）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交通管理部门的解释，“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具体包括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人力三轮车、板架车、手推车等。依据广东省的上述规定，市民骑自行车违反交通管制规定强行通行且不听劝阻，“一口价”罚款1000元，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在我看来，面对骑自行车违规采取如此刚性且数额较大的罚款措施，显得过于严厉，不近人情，不合情理。

首先，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除了必须遵守责任法定原则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责罚相当原则。很显然，不同种类的非机动车强闯交通管制，对交通秩序的不良影响和实际破坏是有所区别的。不仅如此，“不听劝阻”的情形肯定也是有所差别的，这些凸显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的不同。而法规则不分青红皂白统一罚款1000元，违反责罚相当原则，缺乏合理性和公平性。

同时，一部法律法规对同类或者类似违法行为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也要保持整体上的协调和一致，切实避免畸轻畸重、较重违法轻罚、较轻违法重罚现象的出现。而纵观《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比如条例规定，驾驶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犯罪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不足百分之一百的，发生未伤人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应当即行撤离事故现场而未撤离又导致发生次生事故的，均处1000元罚款。这三种违法行为，哪种不比骑自行车强闯交通管制且不听劝阻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何况，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汽车的，或者将汽车交给未取得驾驶证的人驾驶的，才处1500元罚款。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运输剧毒化学品超速不足百分之五十的，才处200元罚款，它的危险性与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与骑自行车强闯交通管制相比，到底哪一个更大，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个是“单车强闯交通管制罚款千元”条款的执行问题。法律的威慑力不在于它的严厉性，而在于它的不可避免性。深入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广东省的这一严厉规定，很难执行。因为多数情况下，骑自行车的人往往收入较低，一次违章就要被罚款1000元，明显过高。他们既不可能甘心受罚，也有可能根本拿不出这些钱，除了恶化警民关系外，岂不是要大大提高执法成本？

为官者当读一读《孟子·梁惠王上》

汪 强

在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部分农村寄宿制小学，小学生自带大米、黄豆到学校蒸饭吃，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黄豆蒸饭，一吃就是几年。由于营养跟不上，小学生普遍个头矮小，有些学生在晨跑时还会晕倒。（《北京青年报》3月30日）

由此，我想到了上周《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该调查说，92.6%的人首选“公款吃喝”浪费最严重。为证实这一说法，我举两个例子：

例一：广东汕尾市“史上最牛烟草局长”陈文铸被曝光涉嫌多项腐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局长掌管的烟草局尽管所在地区经济并不发达，一个月招待费却高达200多万元，就连本单位食堂一天的招待费也达到惊人的13万元。汕尾烟草的经营规模和利润，以及当地人口和消费水平，都在全省倒数前几名，但它的业务招待费却在最近三年内暴涨数倍，2010年达到1200多万元。

例二：2010年12月21日至23日，江苏海门市审计局接待四川绵竹审计局来宾，两天花去10万元，其中，一大笔钱花在吃上。

一方面，这些小学生缺钱吃饭；另一方面，公款吃喝慷慨大方，丝毫不缺钱。一方面，对这些小学生来说，寻常的蔬菜、水果、肉食品都是稀罕物；另一方面，公款接待中好多山珍海味吃不了，倒进了泔水桶里。一方面，这些小学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比同龄人平均身高矮11厘米），还经常晕倒；另一方面，一些官员营养过剩，患上高血压、高血糖、脂肪肝等富贵病。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对比呀。

我忽然想起了《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段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那么，假如孟子还活着，看到那些小学生每天吃两顿黄豆蒸饭，由于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而众多官员却用公款吃山珍海味，吃不了倒进了泔水桶里，会怎么说呢？会不会说这是率人食人，或者说这是率官员而食小学生？

能让孟子发出类似感慨的不只是吃的问题。比如，一方面，公车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耗费的银子相当于国防费用；另一方面，学生缺少校车，不得不挤进农用车，导致车祸频发。对此，孟子又会说什么呢？

近几年来，对孔孟之道的争议甚大。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但不管怎么说，孟子的这段话没有错。我希望为官者特别是决策者，认真读一读这段话，并从中受到启发，下大力气改变这种穷学生吃饭困难、官员公款吃喝挥霍无度的现状。假如每年的公款吃喝降下3000亿元，那就可以让1亿学生的营养状况有所改善。

孟子接下来说：“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意思是说，假如为官者不能解决率兽而食人的现象，就不配称为老百姓的父母官。用今天的眼光看，父母官的说法有点陈旧。但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不能改变上述现象，官员就没有资格自称是人民的公仆。

浅薄的官员微博终将被淘汰

修仰峰

官员开微博已不是新鲜事。最新数据显示，在新浪微博中，已开通并认证的官员实名微博已有1300多人，代表政府机构的微博也有2000余家。官员微博热的背后也出现怪状，比如有的官员关闭评论功能，有的攀比粉丝数量，有的一条微博都不发，却热衷用非常规手段增加粉丝数。（《中国青年报》3月30日）

我们不能说，开微博的官员就一定比不开的官员亲民，但能开微博不是坏事，至少说明这些官员能与时俱进。即便当下的官员微博热不乏赶时髦的成分，但这种时髦总比成天泡在酒楼和娱乐场所的时髦来得好，至少它在客观上给密切官民沟通提供了一种可能。

至于报道中列举的那些官员微博怪状，我觉得要区别看待。如果官员开微博是其职务行为，那么，关闭微博评论功能、攀比粉丝数量、用非常规手段增加粉丝等等，自然不符合为民服务的宗旨，有损他们的履职，应该予以叫停和惩戒。

但如果官员开微博是个人行为，那又另当别论了。这就好比公共场合裸体，有扰乱公共秩序之嫌，警察可以拘留之；但如果在家里裸露，则是人家的私权了。同理，这些官员出于个人爱好开通的微博，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摆弄。攀比粉丝数量，用非常规手段增加粉丝数量，尽管这些看起来很好笑，我们大可以嘲讽他们“猪头”，虚荣心强烈，但这只关乎他们的个人道德品质，跟官德、履行公务没多大关系。

更何况，微博自有运作规则，也自有优胜劣汰的功能。我相信，随着网民素质和理性能力的日益提升，类似用非常规手段增加粉丝数量的这些小伎俩，迟早会没市场的。那些浅薄的官员微博也将被淘汰，成不了主流。

我很赞赏“微博界中国最具影响力官员的20强”之一的浙江海宁市司法局局长金中一所说的一句话：“我的粉丝，都是一条微博一条微博地写出来的。”——截至3月29日，他拥有粉丝80828人。

天道酬勤，这法则同样适用于微博世界，认真地写，真诚对待每一条评论和每一个粉丝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官员，都将成为微博弄潮儿。而开微博之于金中一的意义，不仅仅是体验到拥有数万粉丝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不知不觉中，他的规则意识得到更新——微博让他深深意识到，把官场讲空话套话那一套东西带进来，是行不通的。

网络改变世界，微博涤荡官员头脑。这应该是官员开微博的最有价值的收获之一。

“约谈”最好别成“密谈”

吴应海

针对联合利华等日化企业和顶新(康师傅）等方便面企业的涨价信息，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经济之声记者专访时表示，发改委对此事高度关注，已经约谈了相关企业，了解情况，并明确表示，各类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不得随意搭车涨价，更不许串通涨价、哄抬物价。（《北京晨报》3月30日）

洗涤用品和方便面等居民生活必需品，其价格集体上扬，虽不像肉、油、米、面等商品那样“一涨而动全身”，影响巨大，但同样会助推CPI升高，增加群众生活负担，特别是贫困群体的感受会非常明显。因此，国家发改委闻涨而动，紧急约谈相关企业负责人，很有必要。

那么，国家发改委和这些企业都约谈了些啥呢？照我的猜测，至少应该包括下面这些内容：一是询问这些企业是不是真的想在近期涨价，有没有故意串通涨价；二是请这些企业亮亮涨价理由；三是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涨价理由不充分的企业进行驳斥，对意欲串通涨价者进行警告，甚至是当头棒喝；四是对“涨得有理”的企业进行劝说，请他们多承担一点社会责任。

国家发改委果真是这么约谈的吗？有没有明明发现了问题，却非但不拍桌子，反而和风细雨，甚至视而不见呢？还有，在约谈过程中，企业是如何申辩的，如何保证的，国家发改委又是如何要求的……所有这些我们一概不知，因为国家发改委根本就没有公开相关内容。为啥不公开呢？可能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吧。譬如前些日子，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就曾表示，针对去年违反土地政策供应现象，国土资源部已对20个县市一把手进行了约谈，他们同样没有公布约谈内容。

公众却对约谈内容充满了好奇，无不希望能知晓约谈细节。而事实上，无论是国家发改委对欲涨价商家的约谈，还是国土资源部对违规县市一把手的约谈，都不是什么国家秘密，完全可以公之于众。同时，这种公开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更是为民众的监督创造条件。因此，国家发改委最好能顺应民意，主动公开约谈的详细内容，而不是把约谈弄得跟“密谈”似的，那样，只能捂出猜疑和不信任来。

但愿今后所有政府部门都能“开门约谈”，听任公众进行“围观”。这样做，既能给被约谈者施加更大的压力，又能获得民意支持，何乐而不为？

论文数量和中国崛起不是一回事

域外之音

王 冲

3月28日，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说，中国在国际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已跃居全球第二位。

数据显示，中国的科研论文1999年至2003年间位居第六（占总数的4.4%），2004年至2008年间超过日本，跃居第二（占总数的10.2%），仅次于美国。报告预计，到2013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发表科研论文最多的国家。

这个消息当然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法新社说，中国在科研论文产出上以火箭速度上升至第二；BBC惊呼，两年内中国将在科学领域超过美国，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这个国家正准备做一次“全球性卷土重来”。

国内有网站迅速跟上，说科研论文第二“是中国崛起的新信号”，这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比数量，中国在大多数领域都可以轻松地进入世界前三，可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是民族创造力的结晶，并非纯粹以数量取胜。

法新社说，数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质量提高。衡量科研论文价值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引用率，尽管在这方面中国也有所上升，却落后于其研发投入率和论文产出率。中国的科研论文要追上西方的质量标准，还需很多年。

《卫报》也称，美国在1999年至2003年和2004年至2008年这两个时期引用率都名列榜首，分别为36%和30%。英国居第二位。中国的引用率则从实际上的零上升为4%。

引用率为4%，意味着大多数论文是“垃圾”，这其实和专利一样，前几年外媒报道说中国人的专利数量虽然很多，但很多是“垃圾”专利。

2010年1月，《纽约时报》曾邀请一批专家探讨中国能否成为科技领导者。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前教授约翰·高认为，中国要想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持续不断的进步，有赖于其将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的能力。在现有体制下，本土人才和外来人才如何融合，将是一个难点。

华人科学家、美国布朗大学纳米科学与软物质研究中心主任肖钢认为，在内部和地方的评估程序当中、在资源分配和资金申请方面，主观因素往往会压过客观标准。在地方政府和大学这一级，在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方面，在履行科研资金承诺方面，都可能会有延迟。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也刊发题为《中国科研，发表还是灭亡》的文章说，中国买卖论文等造假行为的市场在2009年达到近10亿元人民币。一系列重大学术造假事件凸显中国的学术评价系统过于强调发表论文，这促使了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急功近利的文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官僚干预学术活动。文章引用方舟子的话说，中国的大多数学术评估——人员聘用、晋升、资金分配等——是由非该领域内专家的官僚主义者执行的，结果，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评价研究的质量，成了评估的标准。

委内瑞拉驻新加坡大使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的观察最为深入、透彻。他今年3月初在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撰文称，既看到了中国争当世界技术领袖的意愿，也看到了阻力和困难所在。

他认为，中国缺乏批评性和个性化思维。中国人的思维受铁的纪律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丧失了自由飞翔的能力。这样一个社会似乎更适合于在明确指令下的繁荣，即精英负责思考，其他人负责追随，而不太有利于鼓励个人的创造力。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中国永远不能产生像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创意天才。